

# 翟裕生:我还没完成任务

■本报记者 冯丽虹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伴随着问候,是他招牌式的有力的握手。

他是德高望重的院士,曾担任过大学校长,获得过何梁何利奖。不过,这些名誉并没有让他拒人于千里之外。朴素、平易近人,是他给记者留下的印象。

从1952年至今,他从事矿床学教学科研工作已超过一个甲子。得益于数十年野外地质工作的锻炼,尽管已至耄耋之年,他依然身形健朗,精神矍铄。

他曾有一个理想,一生研究500个矿床。这个数字现在已达450多个。他说他还没完成任务,还有40多个矿要看,还要继续研究。

为了梦想,84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翟裕生依然如60年前的那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出野外,下矿井,钻巷道,实地为矿藏“把脉”。

从“无关雄心”到临危受命  
中学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对翟裕生的成长产生了尤为深厚的影响。至今他还记得语文老师裴学海先生以“裕慰苍生”为立意,为他取字“慰苍”,希望他“以天下为公,以服务广大民众为己任”。

“一开始我并没有像裴老师所期望的那样,因为裕慰苍生的崇高目标与雄心壮志才考北大地质系。”翟裕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坦言。当时自己只是觉得学地质能接触大自然,可以游山玩水,走遍祖国名山大川。

随着对地质学的逐渐了解,翟裕生逐渐发现这门学科奥妙无穷,研究也“越钻越深”。1950年,在马克垚教授的引领下,他参加填制了人生第一幅1:50000地质图——密云县镇罗营幅;1951年,在张炳熹教授指导下,他参加了第一次矿区实习,与其他两位同学共同完成了对鹤岗煤田的地质调查和储量计算工作。

1952年,翟裕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担任矿床学助教。他参与了张炳熹先生领导的湘、赣、闽、浙四省成矿规律研究项目,共同提出构造—成岩—成矿带的概念,被评为我国60年代区域成矿研究的重大成果。

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苏方原拟派来讲授矿田构造课的专家不再来华,国内矿田构造学课程因此一时之间面临无师授课的危机。在此关头,翟裕生被“临危受命”。

为了给国家“争口气”,他深入东北等地的老矿山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搜集典型事例。一次,他独自在坑道内观测,研究兴起,全然忘记了周围的环境。当他作完记录,前脚刚走过矿

他曾有一个理想,一生研究500个矿床,这个数字现在已达450多个。他说他还有40多个矿要看……



翟裕生在矿上

口,采矿场内的矿石就“哗啦啦”地滚了下来,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经过辛苦调研,翟裕生带着一大摞第一手资料返回学校。他系统地参照对比苏联和欧美同行的矿田构造文献编写讲稿,所授课程大受学生欢迎。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陈毓川、李文达等地质学者顶风前行,共同组织了“宁芜火山岩区铁铜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研究,在1972年至1976年间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地区的铁(铜)矿成矿特征。这一阶段的创新成果,对此后我国火山岩区矿床研究起到推动作用。项目研究获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奖。

## 秉烛照人 以生为先

“无论处在哪个岗位,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热爱学生。”这是翟裕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对此同样身体力行。

1985年,翟裕生从武汉地质大学调回北京,主持地质学院二次建校,先后担任地质矿产部北京地质教育中心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首任校长。

彼时,一切百废待兴,学校教学硬件不足是家常便饭。为了学生的健康,翟裕生决定把办公

楼让给学生做宿舍,和教师们迁到阴冷潮湿、供暖条件很差的平房小院办公。部里拨了十万元,按指标可以买一辆新“桑塔纳”做公车,他们会不得花,省下钱去装修教学实验室。学校住房困难,翟裕生全家在筒子楼住了18年。

在翟裕生看来,热爱学生首先就要教好。“教学是个良心活儿。每一批学生,每一个班级、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点,应该对学生负责,因材施教。”他常说。

教学60多年来,他的讲稿从未重复过。他总把科研中的新成果和经验纳入教学内容,力争使授课内容既新鲜又实在,启发学生的兴趣。

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他的第一个博士生赵鑫鑫的学位论文完成后,因为担心自己的研究观点和老师相左,迟迟不敢交给他看。翟裕生知晓后便与赵促膝长谈,打消了他的顾虑。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对就听谁的,没有学生因此而冒犯老师的说法。”翟裕生说。为了搞清楚具体情况,他特地再去矿山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赵的观点有一定依据,便支持鼓励他将观点写入论文中,并出资帮助他学位论文作为专著出版。

至今为止,翟裕生教过的学生早已桃李满

天下。除本科生以外,单单硕博研究生培养人数已至76人,博士后10人。如今,他仍在这个岗位上乐此不疲地工作着。

## 愈老弥坚,探索不懈

“翟老师对科研的饱满热情和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弟子、地大副教授王建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1990年,60岁的翟裕生已功成名就,本可以颐养天年的他再一次踏入新的研究征程。他辞去了地大(北京)校长职务,继续耕作,近40年的实践积累与理论上的不倦探索使他进入科研高产期。

据初步统计,1990年以来,以他为主要作者或主编的出版物包括《成矿系列研究》《区域成矿学》《成矿系统论》《矿床学》等15部教材与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140余篇(部),占他研究成果总数的2/3以上。

1999年,69岁的翟裕生以其出色的科研成果和高尚人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然而,已近古稀之年的他却仍不服老,依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

进入新世纪以来,地球科学不断朝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翟裕生以其特有的敏锐科学洞察力认识到,要想推动我国矿床学研究,也必须用系统的方法来进行矿床学研究,并将系统理论引入成矿学研究。

2010年,已至80岁高龄的他将成矿系统理论和研究思想进行总结,出版了《成矿系统论》一书,构筑了成矿系统理论基础,使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被同行广为应用。

2012年10月,翟裕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60余年矿床学研究成果再次得到肯定。他把20万元港币奖金全部捐赠给了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青年教师奖励基金。

“按理说,翟老师早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他现在在探矿的精神劲头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足。”对老师的“倔性子”,王建平颇为无奈地说。

如今,已是84岁高龄的翟裕生仍不知疲倦地奔波在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一线。他希望自己可以再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科研骨干;对自己已获得的科研成果再加以检验和修正;对国家相关地矿工作提出建议,贡献力量。

“科研是无止境的,是世代传承的。我希望自己做好我这个环节的接力!”翟裕生说。

# 姚远的科学传播之路

■本报记者 张行勇

“如今,廉颇老矣,夕阳西下,自认并不后悔这一职业选择,如有来生,下一辈子还做编辑。”这是西北大学编审、博导姚远在不久前的西北大学学报百年庆典座谈会上的感言片语。

从1980年入学报从事科技编辑工作至今,姚远可谓资深编辑。“编辑要拿起两支笔,以红笔为人作嫁,以蓝笔修炼内功,自强自立。”这是他在《中国科技期刊编辑界》提出的口号,而他自己也正是参照此言走过了34年的科技期刊编辑之路。

姚远的编辑人生,概括为两点:一是耗青春干小事,主编了一份学报,走出了一条艰苦创业之路;二是亲身实践,提出了一个口号,形成一个编辑成才和编辑部建设的模式。

## 以红笔为人作嫁

1980年,年尚25岁的姚远,放弃担任陕西省学联主席的机会,从学生工作调回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做了一名普通的科学编辑。

在最初的两三年里,条件艰苦,姚远独自一人承担了《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征稿、初审、请专家复审、编辑、校对、印刷和发行等重担。

当时,铅排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报难度很大,文种多,符号复杂,印数亦不过2000多份,故西安有规模的印刷厂谁也不愿印刷。姚远只好找到远郊秦岭山脚下的一家军械印刷厂,每季学报的印制至少要跑三四趟。每季学报发稿,校对,他总是清晨五六点起远郊班车,在厂里与工人师傅一起找铅字、改版、搬运、校红,晚上匆忙赶回西安,误了班车只好拦出租车。

繁重的工作占去了姚远的所有精力,甚至旅行结婚回来一下车就水天雪地地给教授们登门分发校样。有一次,他连续工作48小时,以致晕倒在地而磕掉“牙”,口内缝了七八针。

就这样,姚远硬是凭着一股对学报事业的热情和责任感,一步一个脚印。他先后历任学报理科编辑部主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任、主编。他将一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献给了《西北大学学报》出版事业。编辑部也从独自一人到先后调入和带出10余名编辑,并提出了“立足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展示西部科技文化风采,兼顾理论探索与应用开发,崇尚学术争鸣与创新求实”的办刊宗旨,将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大学学报办成了全国优秀科技期刊、教育部优秀学报一等奖和首届全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

多年来,姚远先后接触和指导作者9000余名,编辑或主编学报200余期,发稿9100余篇,总字数7200余万字。发表了李政道、丁肇中、丘成桐、王选、吴文俊等20余名院士,以及傅种孙、李赋都、何炳郁等一批著名科学家的论文。

## 以蓝笔安身自立

姚远常说:拿好红笔,必须有拿蓝笔作为底气,否则就像一只不盛东西的袋子,只能匍匐于地,难以直立,也难以挺起胸膛,站得直,肚里没货,眼里没水,又何谈做好编辑!所谓“打铁先要本身硬”就是这个道理。

姚远以蓝笔安身自立的最重要成果是倾尽心血,先后在《编辑学报》《中国出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等刊发表了220余篇学术论文,完成了《中国科技期刊史》《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两部合计150余万字的专著。

其代表作《中国科技期刊史》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清末和民国间的2100余种科技期刊特别是500余种中国科技期刊作了历史性论证,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科技期刊史”。这既是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又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反响。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与我国台湾合办的《中国科学史通讯》发表书评誉其为填补空白之作和开辟了科技史研究的新方向。

目前,姚远仍然兼任西北大学出版与传播科学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数学与科学史研究中心及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等。

“不盛东西的袋子是站不直的。”这句古希腊的名言成了姚远对自己的研究生、博士见面时必须讲的一句话。他向记者进一步解读,“人生必须有意义地生活,因为人的生命极为短暂。一个人必须终生不断地学习,用知识充实自己,否则在社会上就难以站直了!就像不装粮食的,干瘪的袋子一样匍匐在地,趴在墙上看,在生活中毫无用场,非但无用,甚至还可能污染环境”。

年近六旬的姚远,以34年的大学学报编辑人生经历注解着这句话。



姚远

## 记忆

杨君辉和戴宗铎,在密码研究的领域里,堪比“黑风双煞”,是国际上相当让人望而生畏的一对传奇搭档。

# 中国密码界的传奇夫妻

■萨苏

前几年有一部小说曾风靡一时,并且被拍成了电视剧,那就是麦家的《暗算》。

既然是小说,自然有些演绎,然而,这部作品情节曲折,悬念诡异,吸引了很多读者和观众。其中也不乏科学院的老中青们,他们看这部作品时,除了啧啧以外,还多一点额外的兴趣,那就是推测一下谁是作品中人物的原型。因为假如真的有一个类似“701”的机构,那中科院数学所肯定和它脱不了干系,这儿荟萃着一干专家,算得上是中国密码研究的一个“老巢”,而且,《暗算》里面确实提到了从数学所调来的经过。

无论事实如何,还是不免有好事者乱猜,对号入座。其中,对那位从数学所被抓了的“黄依依”,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黄依依的原型,很可能就是信息安全国家实验室的戴宗铎研究员。

相信戴宗铎本人听到这样的说法,必会摇头苦笑。

戴宗铎,江苏人,长期在科学院从事密码研究,成就斐然,放到麦家所说的年代,她正是“黄依依”那样风华正茂的年龄,难怪有此说。实际上这纯粹是捕风捉影,以我的了解,戴宗铎和黄依依的相同之处,也就是气质比较洋派,并且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罢了,除此之外,她们绝无相似之处。而且,如果麦家笔下的黄依依真的基于戴宗铎,那以他的文笔,是绝对不会放过戴宗铎的那一半——杨君辉研究员的。

杨君辉和戴宗铎在密码界是著名的“夫妻店”,如同《神雕侠侣》中君子剑与淑女剑的传奇人物。

不过,在少年时代我的眼睛里,根本想不到杨君辉和戴宗铎是什么“学术权威”,戴宗铎在数学所绝对没有“黄依依”那样的特立独行。早年,戴宗铎最让人羡慕的,是她有一个特别温暖的小家。她的丈夫杨君辉长期和我父亲在一个研究室工作,家里外头一把手,记得当时随我娘到杨君辉家,看到他收拾得整齐精致,回来后我娘大叹不如,也想照样做起,可惜仅仅坚持了三天。

那个时代“老九”们干活上得了瘾常常把事情带到家里来,我父亲这儿就是这样“窝点”。大家都不富裕,到了饭点我娘或者哪位手痒痒的研究员炒上一盘鸡蛋,弄几张大饼卷了,就能宾主尽欢(更多的时候是到吃饭的时间就纷纷散伙,大家都是文化人,不好意思落下蹭饭的名声)。而话题也就不时从工作转到孩子升学、物价



晚年的戴宗铎

波动等等上面去。这时候,各位研究员的表现就各不相同:何育赞是说话先搔头,张寿云老看表(可能是怕太太上门来抓),杨耀武喜欢花生、瓜子、核桃等一切带皮的小食品。几对夫妻则表情各异,充分显示家中的风格不同——我父亲是大炮,我娘是机关枪,一个有质,一个有量;项可峰是“大弦嘈嘈如急雨”,杨立芝是“小弦切切如私语”,夫唱妇随;戴宗铎听得多说得少,杨君辉则嗓音洪亮,和后来当了唐老板的唐有三大唱对台戏,这两个人一个福建一个广东,虽然说的彼此明白,但外人看来简直是鸡同鸭讲……

加上一个听话的小姑娘,杨君辉、戴宗铎的家,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哪儿知道这表面文质彬彬的两口子,在密码研究的领域里,却堪比“黑风双煞”,是国际上相当让人望而生畏的一对传奇搭档。

杨君辉也是研究密码的,而且名气比戴宗铎还要大。在数学所一提到密码,大家总是想到“西安事变”,原因就是数学所章照旨、杨君辉这两位大拿的名字连着念起来让人想起救国领袖“张杨两将军”。

有的时候,一加一不见得等于二,夫妻同在一个领域未必学术上就一定是双倍效应,其中一个依靠另一个的情况在所难免。

然而,杨君辉、戴宗铎却恰好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例子。原因是这二位的研究领域既相关又有所不同。戴宗铎专注密码的算法,而杨君辉恰好研究怎样把算法用计算机来实现。

设计者,她的灵气无与伦比,然而,据熟悉她的朋友讲,林徽音作设计和梁思成搭档的,林徽音从来只画草图,至于怎样变成建筑蓝图,则是梁思成的事情。

如果说林梁合作,属于珠联璧合的典范,那么,杨戴组合,就该称作“前店后厂”了。在这个领域想挑战他们两位,你都要掂量掂量,如果不是在算法和计算机两方面都有极其出色的能耐,还是放手的好。找俩专家合作来挑战行吗?答案还是不行。人家两口睡到半夜来了灵感都能起来讨论解决问题,或者杨君辉觉得挠头的时候戴宗铎肯定可以用不给他中午饭吃来要挟,随便弄两个专家,能做到吗?

于是,我们都钦佩而且羡慕他们。他们的小姑娘年龄比我们小一些,便被大家视为小妹。不留神,小妹发来的照片上,居然也出现了小家伙,你不能不感叹时光过得真快。

有一天和家里电话联系,忽然就听到一个噩耗——杨叔叔去世了。

一时难以相信,杨君辉紫红色的健康面色在眼前一闪,一年多以前,他还来过日本。虽然在科学院这个圈子里“英年早逝”是经常听到的词句,但以他的身体和性格,真是不该。

然而,这确是真的。杨君辉因为身体不适,发现有黄疸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论却是肝癌晚期。

那一段时间,我娘很担心戴宗铎,怕她受的打击太大,他们夫妻的感情太好。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戴宗铎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的担心就越发沉重。

有一天,听到一个消息,戴宗铎到彼得堡去参加国际密码学年会了。

后来才知道,那一年,戴宗铎的论文在年会上受到了极高的学术评价,在那届年会的论文集占据着相当显著的位置。会上,发表完这篇论文演说后,戴宗铎放下手稿,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她说这篇论文中,包含了她和她爱人杨君辉研究员两个人的研究成果,可惜,他再也不能站在这个讲台上了。回答戴宗铎的,是全场的肃然,而后持续而深沉的掌声。

去年九月,我回到北京,在家门前遇到经过的戴宗铎。她问起我的生活情况,也说起小妹。抬起头,看到她的目光平静如水。那天,戴宗铎先生,正在去给她的研究生上课的路上。

## 纪念册

100周年 1914年3月7日,孙羲诞辰

中国农业化学的奠基者孙羲先生,安徽省安庆人,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1946年被聘为农学院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土壤农化系主任,全国农业化学教材编写组组长,中国土壤学会理事兼第一、二届农业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孙羲毕生致力于中国农业化学和植物营养学的教学和科研事业,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农业化学教材,为中国农业化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为农业化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00周年 1914年3月7日,徐冠仁诞辰

中国核农学的创始人徐冠仁,江苏省南通县人。早期从事水稻性状遗传、不同类型水稻杂交和不孕性遗传的研究,曾获自然科学论文奖。致力于核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创建中国第一个原子能农业利用的研究机构,发起并组建中国原子能农学会。他将高粱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引入我国,培育出第一个高粱不育系和“原新1号”等优良组合,为我国高粱杂种优势利用作出重要贡献。2004年2月18日逝世。



40周年 1974年3月3日,张克威逝世

中国农业教育家、畜牧学家张克威出生于1901年,1919年毕业于吉林农学院师范学校。同年五四运动爆发,张克威开始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是由于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是不懂科学。所以,他要走农业救国的道路。1931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建国后,张克威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沈阳农学院院长、党委书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院长。上世纪50年代主持苏联大白猪表现异常的研究,并确定其为日本乙型脑炎,纠正了疑似布氏杆菌病的错误结论,使大白猪在我国得以保留和推广,成为杂交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的猪种资源。后又主持育成良种“沈花猪”。(周天)

